

中国藏族人口科学讨论会会议综述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有459万藏族同胞,其中45.64%居住在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西藏自治区。由于西藏地域辽阔,地理条件复杂,交通十分不便,难以取得关于西藏地区全部藏族人口的实际调查资料,因而长期以来藏族人口科学研究进展较为困难。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实施过程中,首次对西藏自治区全部人口进行了包括出生死亡人数、婚姻状况、生育状况等十八个项目的直接调查登记,并使用具有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电子计算机,高质量地完成了普查资料的数据处理工作,取得了丰富的西藏人口统计资料,从而使全面分析藏族人口的发展变化过程成为可能。为了充分开发利用人口普查有关藏族人口的宝贵资料,并通过分析研究藏族人口状况,更有效地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宣传藏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发展进步,增进民族团结,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于1992年7月24—26日在古城拉萨市召开了中国藏族人口科学讨论会。这在中国人口科学发展史上尚属首次,标志着中国藏族人口科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家统计局、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张塞致开幕词,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江村罗布、拉萨市市长洛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多杰才旦到会祝贺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来自西藏、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省区人口普查办公室以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央统战部、北京经济学院、兰州大学、四川大学等27个单位的近7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共50

篇。会议期间,代表们就中国藏族人口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等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通过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学术观点,并在不少问题上取得共识。讨论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一、藏族的人口数量与性别年龄结构

我国藏族人口的发展过程是国内外各界人士普遍关注的问题。由于缺少确凿的数据,以往人们对藏族人口数量的种种推测数字差距较大,有些外国学者、通讯社甚至公开称达赖为“600万藏人的领袖和代表”。为此,北京大学马戎,中央统战部霍钟权等代表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历史资料 and 人口普查数据对我国藏族人口数量进行了分析,他们的论点是:几个世纪以来,我国藏族人口从未达到600万人,即使在古代鼎盛时期(吐蕃时期)藏族人口也不过约400多万人。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字277.6万人是接近实际的,对此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是认可的。1962年达赖提出藏族人口总数为700万—800万人,纯属毫无根据地夸大我国藏族人口总数。

在建国后的40多年间,我国藏族人口数量显著增多,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藏族人口达459.33万人,比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增加180多万人,增长66%。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根据西藏和其它藏族人口聚居地区的具体情况,为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而采取了鼓励生育人口政策的结果。由此形成的藏族人口年龄构成与全国人口年龄构成相比,其特点主要是少年儿童人口比重高、老年人口比重低、劳动年龄人口

比重低、总抚养系数相对较高。藏族人口和其它少数民族人口一样,已经结束了高出生、高死亡、低自然增长的历史,其人口再生产类型正在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过渡。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席津生、北京经济学院张天路等代表利用普查资料着重对西藏自治区人口的发展和现状进行了科学分析,论述了近几十年来西藏总人口中藏族人口的比例一直在90%以上,汉族人口比例从未超过7%,汉族人口数量从未超过13万人的事实,以及西藏藏族人口年龄结构中并不存在某些年龄组人口大量减少的迹象,从而雄辩地批驳了达赖集团和西方势力所散布的“100多万藏胞死于非命”、“藏人在西藏已成为少数民族”等政治谎言。

针对目前藏族人口年龄结构仍处于增长型阶段的现状,与会代表认为,随着人口基数逐步扩大,如果藏族人口继续保持现有生育水平,则藏族人口势将继续以较高速度增长,藏族人口聚居地区将面临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人均牲畜数量减少、畜均草场面积减少、国民经济主要指标人均量下降、人口素质难以提高等一系列问题,这对当地发展经济、加快生活水平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在藏族人口聚居地区实行合理的生育政策,适当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已势在必行。

藏族人口性别比偏低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西藏、四川、云南、青海等省区藏族人口性别比分别为97.45、97.02、98.8、98.4,均低于100。代表们引用大量数据进行分年龄、分地区、城乡对比分析后认为,气候等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是导致藏族人口性别比偏低的主要原因。高寒缺氧的气候、闭塞的交通、艰苦的农牧生活使藏族人口的医疗条件难以得到保障,因而从事流动性大、危险性大的工作的男性人口非正常死亡率高,此外,男性婴儿死亡率也相对较高,这两项指标直接影响藏

族人口的性别构成。

藏族人口性别比偏低现象在解放前出生的40岁以上各年龄组人口中反映较强烈,随年龄组降低而减弱。例如,四川省40岁以下各年龄组藏族人口性别比均在100以上,云南省50岁以下各年龄组藏族人口性别比基本高于100,青海等省也有类似现象。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藏族人口再生产已逐渐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二、人口的婚姻家庭状况

藏族人口的婚姻家庭状况一向被认为具有明显区别于其它民族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1.未婚人口比例偏高;2.女性人口有配偶比例偏低。例如,在1990年15岁及以上人口中,西藏藏族人口未婚比例为32.8%,四川藏族人口未婚比例为33.94%,比全国同项指标高8个百分点左右。考虑到藏族人口年龄构成的因素,做标准化处理后,差距虽然缩小,却依然存在。从分性别人口婚姻状况看,西藏、四川藏族女性人口有配偶比例约为55%,比全国同项指标约低14个百分点。西藏藏族女性人口离婚、丧偶比例分别高达10.32%和3.85%(全国为8.52%、0.34%)。专家学者们分析,藏族人口中女性有配偶比例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解释为在藏族人口中除一夫一妻的对偶婚外,还存在一定比例的一妻多夫婚姻关系。藏族人口的婚姻状况与其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影响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1.宗教的影响;2.婚配比例失调;3.经济文化落后;4.男性人口死亡率高。除此而外,可能还有其它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

关于藏族人口的家庭户特征,代表们从家庭户的族构成、家庭户类型、家庭户规模以及户主率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以西藏为例,1990年西藏共有含藏族人口的家庭40万户,其中全户藏族的家庭户占94.51%,藏族与汉族或其它民族混合户只占5.49%,这表明目前藏族人口内部通婚者仍占绝大多数。从

家庭户类型看，二代户在西藏家庭中所占比例最高，达46.2%，其次为三代户，占18.5%，列第三位的是单身户，占7.6%。单身户比例如此之高，是与藏族人口终身不婚率高、离婚率高、丧偶率高有直接关系。西藏藏族家庭户类型的另一特点是：非亲属组成的家庭户数量多达4.5万户，占全部藏族户的11.8%。这一特征也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

藏族人口的家庭户规模一向较大，这一方面是因为藏族人口生育率较高，另一方面是藏族传统的农牧业生产的需要。例如，1990年西藏藏族所有含藏族的家庭户平均规模为5.20人；全户藏族的家庭户规模较大，平均5.31人；藏汉混合户规模最小，平均4.71人。在全户藏族的家庭中，7人以上户有11.97万户，占31%，其中10人以上户有近3万户，足见藏族人口家庭规模之大。

除家庭户规模外，北京经济学院顾鉴塘等代表对西藏不同性别、年龄、地区的户主率进行了对比分析，论述了西藏女性户主率较国内许多地区高的现象，并指出，这既与长期以来以藏族人口为主体的西藏人口性别比偏低、整个社会女多男少的状况有关，更与西藏的传统意识和习俗有关。

三、人口的文化素质

出席会议的西藏、四川、云南、青海、甘肃五省区代表分别利用普查资料从纵向比较阐述了建国以来藏族人口拥有各种文化程度人口显著增多，文盲、半文盲人口比重大幅度下降，人口文化素质迅速提高的客观事实，肯定了扫盲工作和普及义务教育工作的成绩。例如，云南藏族1982年每十万人中拥有大学、高中、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数量分别为全省平均水平的61%、53%、55%，1990年已分别上升为65%、66%、59%。1990年甘肃藏族每万人口中各种文化程度人口比1982年增加了25.8%。代表们也通过与本省区及其它省区进行横向比较，分析藏族人口在文化素质方面存在的差距和原因，并提出对策。例如，1990年四川

藏族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高达60%，比全国人口文盲率高37个百分点。代表们认为，经济文化基础落后、旧的传统观念、人口增长过快、财政困难、师资不足、交通不便等诸因素相互作用，严重制约着藏族人口聚居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为进一步提高藏族人口的文化素质，当务之急是根据藏族人口的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教育发展战略，加强基础教育，扎扎实实地开展扫盲工作，还要适度控制人口增长，为提高人口素质提供更多的物质基础。

四、人口的死亡率与平均预期寿命

1990年人口普查第一次取得关于西藏全部人口死亡状况的直接调查资料，为全面研究藏族人口的死亡率与平均预期寿命提供了依据。据估计，西藏和平解放初期，人口死亡率为28%左右，平均预期寿命大约只有36岁。1990年人口普查结果，1989年西藏藏族人口的死亡率已下降到8.7%，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到61.9岁，其变化速度是相当罕见的。其它省区藏族人口死亡率也有较大幅度下降。例如，四川省藏族人口死亡率已由1981年的12.8%下降到1989年的7.58%，下降幅度为41.1%。经死亡率差别分解分析，其中由于藏族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死亡率下降了0.38个百分点，占7.2%，由于死亡模式变化影响，死亡率下降了4.9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四川藏族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由56.5岁提高到64岁。以上反映了改革开放后，随着藏族人口聚居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藏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健康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会议期间，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索朗班荣、王韶泉，以及四川大学程贤敏等代表对西藏藏族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的实际值展开了热烈讨论。他们一致认为，西藏人口死亡率明显下降的趋势是可以肯定的。但是，由于西藏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群众对申报死亡人口的观念很淡薄，因

而死亡人口有一定程度漏报，导致死亡率数据低于实际水平。至于1989年藏族婴儿死亡率，有代表认为36.95%是可信的；有的代表持不同意见，他们按机器汇总的普查资料计算全区0岁人口死亡率为93.62%，按手工汇总普查资料计算该指标值为141.59%，西藏藏族婴儿死亡率应接近上述水平；还有代表的计算结果为91.8%。代表们认为，对于藏族人口死亡状况的研究，今后应在资料的准确性和计算方法等环节上进一步努力。

五、人口与经济发展

分析藏族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本次讨论会的中心议题之一。与会代表分别以“西藏人口与发展论析”、“甘肃藏族在业人口状况分析”、“四川藏族人口在业特征初探”、“拉萨市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西藏一江两河开发区人口研究”等为题进行讨论，普遍感到，建国以来藏族人口总体规模迅速扩大，自身素质不断提高，有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尽管与全国相比，藏族人口聚居地区的劳动适龄人口率不算高，劳动年龄人口的文化程度指数和受教育年限指数相对较低，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结构尚未摆脱低收入水平的格局，劳动密集型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与实现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很不协调，但是通过对比分析，人们毕竟可以认识到：藏族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陆续增加，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程度相当充分，就业范围十分广泛，就业人口的行职业结构已经从单一走向全面，并逐渐向合理方向转化。特别令人兴奋的是，一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以藏族人口为主体的、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中青年业务技术骨干队伍已经成长起来，正在各条战线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了早日实现藏族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北京经济学院冯立天等代表将藏族人口与经济发展战略概括为：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以农牧业为基础，旅游业为突破口，交通电讯、能源和教育

为重点，四个转变（即由供给型经济向经营型经济转变、自给自足自然型经济向商品型经济转变、封闭型经济向全方位开放型经济转变、输血型经济向造血型经济转变）为关键，带动国民经济现代化发展。代表们深信，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和支持下，藏族人口与经济的发展必将与全国同步实现各项宏伟战略目标。

会议期间，代表们还就藏族人口城镇化水平、育龄妇女的生育状况、藏族人口的习俗和宗教信仰、藏族百岁老人情况、农牧区计划生育工作等内容进行了交流。

在会议闭幕式上，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副主任孙怀阳总结了会议在组织筹备者和全体与会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所取得的重大收获，他指出，从政治意义上看，通过这次讨论会提交的论文和会议期间的深入研讨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对“西藏人权问题”极为有力的回击，同时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党和政府在西藏政策上的正确性。他认为，这次会议必将受到国内外有关人士的广泛关注，并将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从学术价值上看，这次讨论在许多方面填补了我国藏族人口研究和区域人口研究的空白，为我国人口科学的完善和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从推动人口与社会发展的实际效果看，这次讨论会的收获也是丰硕的，不仅将促进各藏族人口聚居地区更加重视人口问题，完善人口政策，也为他们协调、处理好人口与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关系提供了科学依据。关于今后藏族人口统计和人口研究工作，他要求大家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1. 拓宽信息源，多渠道搜集藏族人口数据；2. 注意搜集有关藏族人口的历史数据；3. 加强领导，增进合作，使藏族人口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4. 搞好藏族人口分析研究队伍的培训，逐步把藏族人口分析推向基层。

三天会期是短暂的，留给与会者的回忆与思考却是长久的。会议在团结、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杜咏）